

DUKU

读库

1104



DUKU1104

威廉·莫里斯 绘

编号: 1104

DUKU1104
2011.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1104/张立宪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33-0383-5

I. 读… II. 张…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IV. ①I217-61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11) 第181113号

读库1104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3398809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5×925 1/16

印张: 20

版次: 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383-5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201	小革命	何荣幸
	国际志工·边缘发声·脱贫行动·援外医疗·有品 棒球·关怀目睹儿·行人路权·灾区媒体·移住人 权·终身学习·居住权益·在地食材·老屋再生· 绿色生活地图·手作产业·地方学·生态教养·自 力造屋·部落音乐·农民市集·民歌采集	
202-219	批评官员何以成为自由	安东尼·刘易斯 何帆译
220-242	百转千回换心路	李清晨
243-280	漫邮记：金花绽放	谭夏阳
281-298	出亡记	傅惟慈
299-317	从繁华说到寂寞	王鹤

小革命

何荣幸

废墟开出一朵花，乱世守护一亩田

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台湾媒体环境持续恶化的此刻，“我的小革命”系列的出现，有点像是废墟中开出一朵花那样不可思议，也有点像是乱世中守护一亩田那样值得珍惜。

2008年6月18日，《中国时报》无预警地传出裁员一半的震撼消息。当时我是政治组主任，这项保密到家的突袭性“社内新闻”，竟是通过同事打电话回报社告知的“社外报道”，才在办公室里投下人心惶惶的原子弹。

那段心痛“中时”沦落至此、声援“中时”工会行动的日子，是《中国时报》这块老招牌最黯淡无光、摇摇欲坠的一刻。而“中时”处境只是平面媒体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台湾报业实已陷入最寒冷的冬天。

在此之前，我在“中时”内部多次呼吁恢复设置调查采访室，结果都如石沉大海，没想到却在最困顿的时候拨云见日。在总编辑王健壮、

政经中心主任夏珍的大力支持下，“中时”老板余建新指派我担任调查采访室主任，重新出发。

不仅如此，健壮、夏珍更放手让我挑选调查室另外四位成员。我带着组成“史上最强先发阵容”（NBA球赛看多了的后遗症）的心情，一开始就决定邀请跟我“武功派别截然不同”（这是金庸小说看多了的后遗症）的资深记者合作，希望发挥彼此激荡互补的加法、乘法效果。

于是，我打电话给素不相识的桃园县特派员郭石城，硬是“拦截”报社安排其担任社会组副主任的原定规划，小郭立即应允加入调查室；接下来我与曾任多年财经组主任、先前并无合作经验的谢锦芳长谈，锦芳在考量几天后决定全力投入；加上长期关怀原住民、环保、农业等议题，与我在政治组长期合作“休耕启示录”等专题的老战友高有智，体制上直属总编辑的调查室，遂于8月1日正式上路。

但调查室团队还缺一角，我很期待能够合作的“中时”电子报副总编辑黄哲斌，此时仍因代理总编辑身份无法离开。我在征询哲斌意愿后虚位以待，两个月后，调查室团队全员到齐。在不知“中时”还能存活多久的高度不确定气氛中，我们这五个具有相同理想与热情、除有智外新闻资历都接近二十年的战友，怀抱“最后一战”的心情相濡以沫、携手前进。

而经历无数次脑力激荡、修正补强后，我们从2009年1月起，每周六固定推出“我的大革命”专版。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块除了描绘“社会趋势”，更强调“进步价值”的人文反思基地。

我们认为，在这个“全球化”与“在地化”相互激荡的年代，台湾社会各个角落，不少人早就用具体行动颠覆传统观念、挑战主流思维，希望形成新的社会价值，打造自己的小小革命，因此我们决定将这块专版命名为“我的大革命”。

有别于主流媒体已经报道太多权势者的意见与动向，我们从各领域小人物打破传统的努力轨迹出发，藉此守望台湾社会正在发生却尚未被清楚辨识的重要变化，并鼓励更多人以具体行动改造社会。

在上述考量下，每块“我的大革命”专版皆包括六项元素：一、行动故事及其背后的进步价值；二、在地化——台湾还有哪些人在做一

样的事；三、全球化——公民RSS：全世界有哪些人早就在做这件事；四、新闻辞典：这项社会趋势代表什么意义；五、“你也可以这样做”表格：行动教战守则；六、“政府与各界应该这样做”表格：监督政府调整思维、与时俱进。

在采访过程中，这些小人物的理想性格、坚定毅力、执著精神，常常让我们钦佩不已，并且深受感动。我们认为，台湾社会需要更多这种“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理想派与实践者，通过他们身体力行传达的社会趋势与进步价值，我们看见了台湾社会向上提升的更多可能。

对我个人而言，“我的大革命”还有段意外插曲。我和哲斌、有智前往南投鹿谷采访“公共食堂”篇主角黄毅纶时，才得知毅纶是受到我的著作《学运世代——众声喧哗的十年》影响，因而决定前往“九·二一”灾区为老人送餐改造自己。我一方面以这位台大社会学妹为荣，另一方面也对自己作品能够发挥影响力——哪怕只是一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感到欣慰。

在这个报纸被视为夕阳产业的高科技年代，我仍然相信，不论媒体形式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文字的力量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因此绝不妄自菲薄。我在另一本著作《媒体突围》中强调拉近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做多少、算多少”信念，今后亦将继续伴随我的记者生涯前行。

其实，从调查室成立、“我的大革命”专版的种种编采创意革新与突围，本身就已经是另一项大革命了。

“大革命”与“大革命”

当我们忙着报道别人的大革命之际，没想到，一场大革命就在我们周遭悄然酝酿。

因为长期触发与累积，调查采访室一分子、我们的好友黄哲斌，在2010年12月辞职并发表“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了《中国时报》”一文，也引发了一场新闻界大风暴。这场风暴引发传播学界与公民团体的积极串联，迫使当局领导亲自出面，宣示今后不再做政治置入行销，政府

“用人民的钱洗人民的脑”的荒谬现象可望告一段落。

坐着牛车留在《中国时报》的我们，对于哲斌的勇气无比敬佩，并深以曾与哲斌长期并肩作战为荣。

然而，选择继续留在主流媒体战场的我们，并不因此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和哲斌都深知，在主流媒体奋斗同样需要坚强与勇气。

回想“我的大革命”专版诞生时，“中时”刚刚走过空前重创，报社内所有新生事物都充满观望气氛，没有几个人会真的相信，这块凭空出现的专版能够持续两年之久。

但正所谓“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开始计划进行一连串的“阳谋”，希望能够颠覆各领域的社会主流价值与刻板印象——其中也包括对于主流媒体的颠覆。并以做多少、算多少的务实态度，一次又一次温柔地冲撞主流。

当“八·八”风灾重建，政府遭抨击漠视受灾户心声时，我们提倡“开放空间”这种创新会议形式以有效凝聚各方共识；当棒球场上涉赌、打假球弥漫成风，我们强调一些有心教练正在基层推动最根本的“有品棒球”以重建运动伦理；当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终生留下阴影而缺乏关怀，我们藉由“关怀目睹儿”故事提醒社会正视这群儿童；当性工作除罪化成为各方议论焦点，我们深入剖析“性自主权”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而当社会对死刑存废纷扰不休之际，我们披露支持废除死刑的国际特赦组织（AI）台湾分会早已致力“人权救援”写信支持外国良心犯二十年……

至于对主流媒体表现的省思，我们更接连推出“公民记者”（江一豪离开《苹果日报》担任苦劳网不支薪特约记者）、“社区媒体”（吴国城返乡创办《山城周刊》，一办就是三十年）、“另类媒体”（网络“干得好新闻”藉搞笑嘲讽时事传达严肃反思）、“草根媒体”（胡慕情、朱淑娟在博客发挥比主流媒体更强大的监督环境议题功能）、“街头刊物”（李取中创办TBI台湾版，让游民可以赚取一半收入）、“灾区媒体”（冯小非、张正扬、陈顺孝远距合作为“八·八”灾民发声）等核心价值，藉此检视与反思主流媒体之盲点。

而在长期报道这些颠覆主流故事之际，我们自己也受到深远影响。

如同哲斌自己对于这段历程的诠释：对他而言，两年来采访、写作“我的大革命”的经验，是促使他投入此一运动（反对政府置入行销）的重要动力；因为每一个“大革命”故事的主角，都让他相信，“勇敢去做，绝不会孤单”。

就这样，我们辛苦耕耘、锲而不舍的“大革命”专版，在两年后开出了哲斌的大革命灿烂花朵。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大革命”则是我个人二十年记者生涯的重要注脚。1994年，初出茅庐的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谋参与“抢救自立行动”、“为新闻自主而走”游行，并在隔年创立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我也在记协首任会长、《目击者》双月刊首任总编辑、媒体改造学社执委等历练中成长学习，在新闻专业与社会实践求取平衡，其后在主流媒体内致力深度报道，一步步走到了“中时”调查采访室的战斗位置。在这层意义上，“我的大革命”专版何尝不是过去二十年我跟所有伙伴为实现理想而努力不懈的某种隐喻。

“我的大革命”首度集结出书后，引起许多回响，让我们相当欣慰。马英九先生更先后造访生态绿咖啡、集集庇护农场，捐款给书中二十多个团体各二十万元，并且在2010年元旦文告中引述“我的大革命”精神，强调要催生“改革行动年”。他的宣示与行动，一方面展现对于社会进步力量的重视与善意，另一方面则需要长期“听其言，观其行”予以检验。

许多学校、社团乃至NGO团体的演讲邀约，以及将“我的大革命”列为指定阅读书籍，则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大革命”专版所传递的精神与价值，确实发挥了某种催化社会进步与理想主义的影响力。

此外，“我的大革命”一书荣获“中时”开卷版2009年度好书奖（美好生活类），2010年并入围“金鼎奖”非文学类年度最佳图书奖；“我的大革命”专版也陆续获得社会光明面新闻奖、国际扶轮社公益新闻金轮奖、第二届学学奖等肯定。上述年度好书与新闻奖的鼓励，让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步伐，并且迎向《我的大革命之颠覆主流》第二本书之诞生。

当功利主义成为显学、现实路线变成王道之际，“我的大革命”主

人翁们燃烧热情、追求理想，让我们看见另一种忠于自己的生存方式。通过一则又一则的温柔革命故事，我们试图告诉读者，颠覆主流是一种值得珍惜的进步价值，只要踏出勇敢的第一步，每个人都可能用颠覆主流的姿态主宰自己的人生。

谨向哲斌的勇气致敬，让我们与所有伙伴共同击掌，继续迎向内心深处小革命的召唤。

“台湾之光”就在你我身边

台湾社会近年追逐“台湾之光”，但蓦然回首，才发现真正的台湾之光就在你我身边。

2011年2月某个早晨，我和同事在寒风中来到八里河岸林怀民住家做深度专访。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创立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无疑是艺文界最具国际盛名的台湾之光，任何台湾之光名单都不会遗漏他与云门缔造的传奇。

没想到，林怀民根本没把自己当作台湾之光。

面对我们的提问，林怀民如此回答：“我不是台湾之光，台湾之光是那些把街道扫得很干净的清道夫，是那些为了应付联考夹在学校和父母之间、仍一心想把书教好的老师，是那些为了捍卫家乡反对六轻的麦寮人，是那些为了环境反对国光石化的彰化人及站出来的年轻人。”

这段话真是闪闪动人。三言两语，就点出了“舍近求远”追逐台湾之光的迷思。

在那当下，我脑海里浮现的，正是“我的大革命”的所有受访者。我认为，凡是为了这片土地永续发展而不懈努力的人们，就是令人敬佩的台湾之光。

早年环保意识还未抬头，许多以行动捍卫环境生态、主张与自然和谐共处者，常被冠上“阻碍经济发展”、“不食人间烟火”、“太过理想，不切实际”等大帽子；即便近年永续发展价值逐渐深入人心，反六轻、反国光石化等行动也还是官方、企业眼中的“麻烦制造者”，主流

媒体不曾把这些行动跟台湾之光连上等号。

林怀民对于台湾之光现象的深刻思考，则再度提醒台湾社会：没有任何东西比生态环境更加珍贵。台湾社会应该重新看待这些理想主义者，珍惜与感念他们对于这片土地的付出。

让我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发生在你我周遭的台湾之光：

为了落实环保观念，杨顺苓因为慈济证严法师一句话，二十年前开始利用假日推动资源回收，如今慈济环保志业不但开花结果，垃圾分类回收更已成为家家户户日常功课；张扬乾身体力行“绿婚礼”，严格检视每天的“碳足迹”，做不到节能减碳时则购买“碳权”进行平衡，一步一脚印实践低碳生活……

为了寻找农业出路，合朴农民市集开创生产者、消费者面对面交易模式，让从事有机耕作的小农找到另一片天；博士生开起“大王菜铺子”力挺小农，强调在地食材观念开心卖菜；神农奖得主赖兆炫则坚持以非基因改造方式耕作，以确保环境及食品安全……

为了珍惜生态环境，有些学校、社区开始进行“绿色生活地图”生态人文制图，以呼应全球绿色地图风潮；有人在住家附近种出一条樱花步道，藉这条“爱妻步道”表达对于环境的呵护；有人拿起照相机与画笔致力生态教育，有人则在强调生态教养的大自然氛围中带领女儿成长……

而为了对抗不公不义，环保律师林三加放弃知名律师事务所的高薪工作，无怨无悔投入中科三期等环评诉讼，并长期致力于环境法制的健全化；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副教授黄焕彰不断揭发公害污染问题，从地方学的视野为环境而战，因而被称为“环境布道师”、“土地验尸官”……

相信读者会跟林怀民一样，敬重这些为了环境挺身而出的平凡小人物，并在这些小革命行动中见证台湾人民改变现状、迈向未来的信心与热情。

事实上，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小革命”，而不是大革命、大论述？

林怀民对于“台湾之光”的诠释，正是我的回答：谁说这些只是

“小革命”？跟许多口口声声大革命、大论述，却严重缺乏行动能力与实践决心者相较之下，这些小革命无疑更能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更重要的是，这些小革命的总和，已一片一片拼出公民社会的轮廓图像，这才是任何大改革、大论述背后最坚实的民间力量。

我认为，“我的小革命”系列，已共同传递“在艰困环境中以具体行动追寻理想”这项社会价值。读者可以发现，这些小革命故事看起来平凡，其实非常不容易；这些小革命主角大多名不见经传，却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如果这些小革命有朝一日形成大风潮、大革命，届时台湾社会无须意外，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

对我们来说，只要拿出行动与决心，小革命永无止境。

国际志工

高有智

“不是他们需要我，是我需要他们。”赖树盛从志工生活中体会到人性自私、懦弱、傲慢与不安，对苦难重新理解。

一个爱玩的大男孩选择在泰缅边境漂流了七年。生于1974年的赖树盛，因为父亲经商失败，从小颠沛流离，念了四所国小；因为自己爱玩，国中念了四年，考上专科却又迷恋登山。爱玩冒险的青春岁月之后，却在异乡边境找到了人生目标和方向，他遇见了难民，看见了苦难，也找到了未来。

赖树盛在二十八岁到了泰缅边境当国际志工，担任台北海外和平服务团（TOPS）泰国工作队领队，在难民营与山区部落从事服务，这是一个他从未踏过的陌生土地。2010年1月离开当地时，却得到满满祝福与感动，这是一段男人的成长旅程，连朋友都笑说，他从无忧无虑的爱玩男孩蜕变成了思虑认真的男人。

他从小就爱玩，在幼稚园中班时发挥了“潜力”。因为贪玩不写功课，上课前赶紧向妈妈求救，没想到，努力拼命的妈妈只会把阿拉伯数字9画成气球，飘满作业本，结果被老师痛骂。他当场放声大哭，这是他人生学到的第一课，“再怎样爱玩，宁可跟老师说忘记带作业本，或者装病不上学，也不能请只会画气球的阿母帮忙代写”。

上了国小，爱上打棒球，赖树盛看着漫画幻想参加日本甲子园球赛，还为此勇敢写信给校长，希望能借到学校仓库的棒球用具。国中还是爱玩，数学怎样考都只有二十分，高中联考放榜，七科总分竟然只有两百多分，只好报读“国四班”重考。历经专科和中兴大学夜间部，一路上都是半工半读半玩，出社会后，一度耗尽盘缠前往欧陆游学与自助旅行将近半年。

懵懂的青年却因缘际会接触了志工服务，原因同样也是“有趣好玩”。没想到，一路越“玩”越大，“玩”到泰缅，从实际参与到出书巡回演讲，赖树盛俨然成为国际志工的最佳代言人。

“学生时参与志工根本不懂意义是什么，就是觉得有趣。”赖树盛幽默地套上当红影片《艋舺》的台词，想起青涩年华直觉好笑。因为受到哥哥赖青松影响，看到哥哥参与环保社团与学生运动，把哥哥当偶像的赖树盛也四处参与社会改造、文史调查与环保志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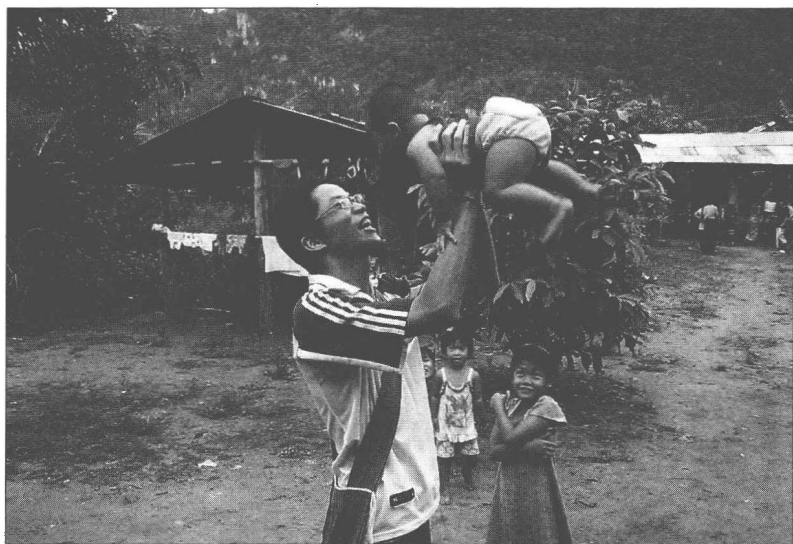
志工经历触发赖树盛思考改造社会与关心社会的议题，也开始敏感弱势者的苦难，逐渐感同身受，思索社会发展的方向。从小就不爱读书的他，竟然前往英国就读东英格兰大学发展研究所，跌破亲友的眼镜，最后又选择到泰缅边境当志工。

“这是我自己设定的必修实习课，未来相信自己会更明了如何为成长的土地而努力。”赖树盛怀抱出岛见识的心情，谎称只有前往泰缅一年，试图安抚忧心忡忡的母亲。没想到，这个谎言越扯越长，一待竟待了七年。“难民营的小孩都从幼稚园上国中了，我妈还会问我何时要回台湾。”

赖树盛在泰缅边境面对的，却是复杂的难民与贫穷议题。泰缅边境数以万计的克伦族人因为缅甸内战，从1984年后纷纷逃往泰国避难，迄今仍有十五万流亡缅甸人被收容在边境沿线的十座难民营里，超过百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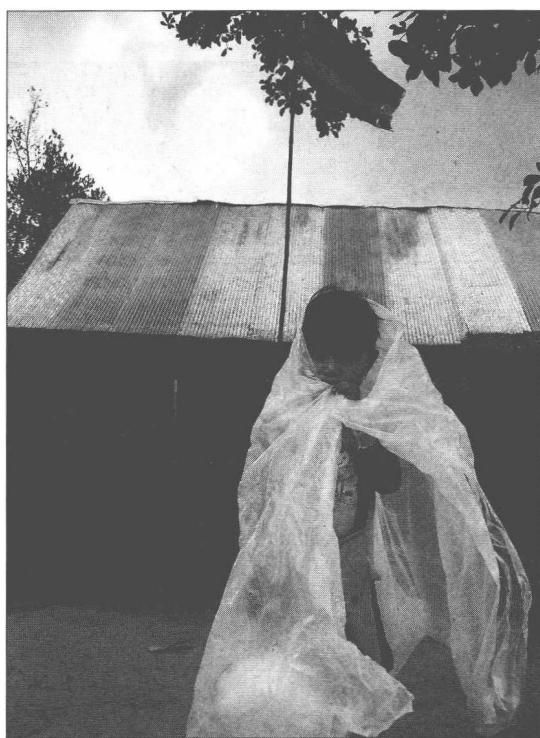
赖树盛在泰缅边境从事难民营的服务工作长达七年，他看见了苦难，也找到了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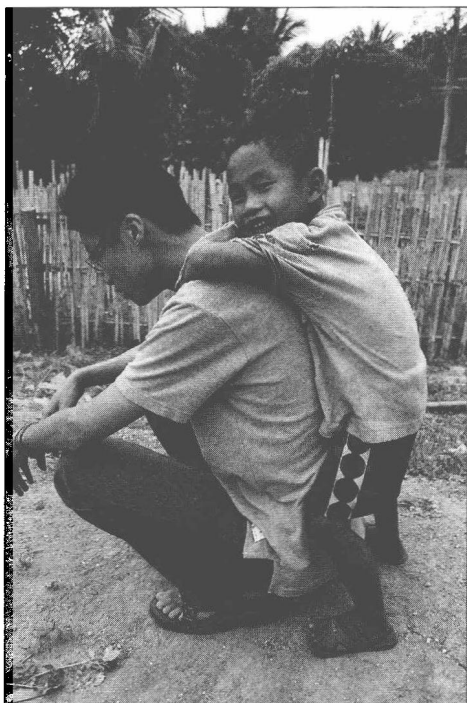
赖树盛与泰缅边境的小孩一起玩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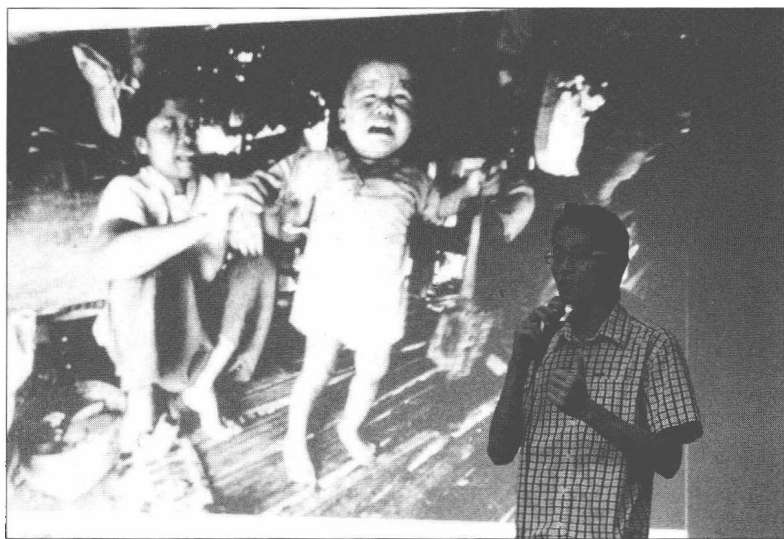
泰缅边境难民营里的儿童上课时的情形。



数十间散布在泰国城乡的缅甸学校，为难民子女提供教育机会。



赖树盛在泰缅边境与克伦族孩童玩耍。



赖树盛巡回分享在泰缅边境当志工的心得。（以上图片由赖树盛提供）